BIBLID 0254-4466(2011)29:3 pp. 125-154
漢學研究第 29 卷第 3 期（民國 100 年 9 月）

戰爭與政爭的糾葛
——北宋永樂城之役的紀事**

方　震　華*

摘　要

發生於元豐五年（1082）的永樂城戰役，在後代的紀錄中被普遍視為一場影響深遠的慘敗，由於宋軍遭受重大的傷亡，導致神宗放棄對西夏用兵的政策，並因此鬱鬱而終。不過，在傳世的北宋文獻中，對於此一戰役的描述存有很大的差異。本文從探討此役發生的背景和過程入手，透過考證傳統說法的真實性，指出元祐時代主政官員的說法，深刻影響了後世對永樂之役的印象。這些反對神宗拓邊政策的官員，刻意誇大了此役所造成的人員損失及後續影響，其目的不僅在於打擊主戰的官員，更是要強調神宗因永樂之敗放棄對西夏用兵的政策，以合理化他們與西夏和談的主張。也就是說，政治立場是形塑此一戰役紀錄的重要因素。事實上，由於反戰論的盛行，北宋時代的戰爭紀事往往存在強調己方損失，忽略軍事成果的特殊現象，永樂城之役的相關紀事即為其中一例。

關鍵詞：永樂城、宋神宗、徐禧、張舜民、新舊黨爭

2010 年 9 月 2 日收稿，2011 年 5 月 28 日修訂完成，2011 年 7 月 28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 本文爲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成果（計畫編號 NSC 98-2410-H-002-155-MY2），並曾宣讀於「中原與域外：唐宋史、中西交流、域外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政治大學，2011.5.27-28）。本文在出版過程中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一、前　言

宋神宗致力於西向拓邊，開啓了北宋晚期一系列對外軍事行動的序幕，[1]在相當的程度上改變了北宋政治和文化發展的走向，由此而引發的爭議亦不下於因王安石（1021-1086）的「新政」所產生的黨派對立。在神宗時代發生的多場戰役中，元豐五年（1082）的永樂城之役，被普遍視爲一場影響深遠的慘敗，在幾部宋代的文獻中，對於此事的記載包含三個重點：一是宋軍在戰鬥中蒙受重大傷亡，折損的官兵與民夫在十萬人以上；其次，神宗（1048-1085），因此役之慘敗而中止對西夏用兵的政策；第三，神宗在精神上受此慘敗的打擊甚大，不僅曾在群臣面前痛哭，更因此鬱鬱不樂以致崩殂。[2]在元代官修的《宋史》中，宋方的損失數字更倍增成爲「士卒、役夫二十餘萬」。[3]受到以上記載的影響，現代研究宋史的學者多以永樂之戰爲北宋歷史發展上的重要轉折，認爲宋對西夏的用兵政策因此役的失敗而暫停，神宗也爲此抑鬱而終，造成政局的遽變。此類說法不僅在相關專著中經常出現，在通史教科書中亦然。[4]不過，隨著對宋夏戰爭研究的持續進行，前輩學者已指出傳統的說法可能有誤。例如：梁庚堯與李華瑞皆指出神宗並未因永樂之敗放棄伐夏的意圖，仍持續籌劃進擊的行動。[5]至於永樂之役宋軍的死

1 參見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6）。

2 相關的記載見於邵伯溫，《邵氏聞見錄》，收入《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標點本）第 2 編第 7 冊，卷 5，頁 132；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點校本），卷 133〈本朝七〉，頁 3189-3190；王明清，《玉照新志》（成都：巴蜀書社，1993，影印涵芬樓藏版），卷 1，頁 1；彭百川，《太平治蹟統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0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5〈徐禧等築永樂城〉，頁 36-45。

3 脫脫等編，《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點校本），卷 486〈夏國傳下〉，頁 14012。

4 傅樂成的《中國通史》是使用廣泛的通史教科書，亦說永樂之敗損失二十餘萬人，軍備耗盡，宋自此無力對夏用兵。參見《中國通史》（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79 新編二版），頁 535。

5 梁庚堯，〈北宋元豐伐夏戰爭的軍糧問題〉，收入氏著，《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上冊，頁 90；李華瑞，《宋夏關係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頁 193。

傷，趙滌賢與李華瑞都認爲宋方折損超過十萬人的說法太過誇大，而各自提出修正的意見。[6]不過，前賢的研究雖已指出部分宋代文獻有誇大永樂之役的死傷及其影響之嫌，但並未對於此一現象進行深入的探討，對於這些誇大不實記載產生的原因及所顯示的歷史意義，未能提出解釋。

從整個宋夏戰爭的脈絡來觀察，宋軍在邊區所興修的堡寨數量繁多。[7]在雙方長期交戰的過程中，堡寨的爭奪與易手十分常見，永樂城又名銀川寨，不過是其中之一。我們應該思考，爲何此一城寨的淪陷，在宋人的歷史書寫中特別受到重視，而被詮釋成產生重大的政治影響？顯然，這不是單單探究軍事行動本身就能解釋，而須將此一戰役的過程置於北宋晚期的政局演變之中來觀察。神宗時期的歷史紀事受到「新舊黨爭」的影響甚巨，已是衆所周知的史實。[8]但是，政府中的黨派之爭如何具體地影響歷史書寫的內容，進而形塑後世對於宋代歷史的理解，學界迄今未有深入的討論。本文將從分析永樂築城的決策過程及神、哲兩朝對此役相關的記載入手，探討政治因素對於戰爭紀事造成的影響。希望不僅能釐清神宗對西夏用兵的經過，更藉此說明宋代戰爭紀事中存在的某些特色，以及神宗拓邊行動所造成的各種影響。

二、進築橫山的提議

神宗即位之後，即鎖定西夏爲征伐的目標，在熙寧年間成功佔領熙河地區後，即籌劃對西夏用兵，乃有元豐四年（1081）秋天五路並進的大規模攻擊行動。但是，宋軍雖在多次戰役中取得勝利，卻未能達成攻下靈州城，一舉殲敵的預期目標；反而因爲後勤不繼，被迫自十一月起陸續退回塞內。[9]神

6 趙滌賢，〈北宋元豐中靈州永樂兩次戰役宋軍死者人數考〉，《學術月刊》1994.6(1994.6): 82；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 190。

7 參見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 221-289。

8 目前學界對於這個議題的探討集中於《神宗實錄》多次修纂的過程，參見王德毅，〈北宋九朝實錄修纂考〉，收入氏著，《宋史研究論集》第 2 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8 再版），頁 102-113；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頁 82-98。

9 元豐四年五路伐夏的過程可參見梁庚堯，〈北宋元豐伐夏戰爭的軍糧問題〉，頁 62-75；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 180-186。

宗在失望之餘，立即籌劃後續的行動，朝中主政大臣也極力附和神宗拓土的野心：

> 上因論西事，曰：「兵不可不試，當先其易者。靈州之役，士氣至今不挫者，由熙州成功故也。然兵危事，尤須嚴重，近亡失兵夫殆十萬。」張璪進曰：「漢武用兵三十餘年，唐太宗亦累年征高麗，士馬喪亡殆盡，持心堅忍，亦卒成功。今陛下仁聖，但當訓練甲兵，以彊國勢，則驅之可無後悔。」[10]

圍攻靈州之役損失了將近十萬人，但主政者只將其解釋爲不足爲慮的暫時挫敗，朝中主戰氣氛的濃厚，可見一斑。在神宗的命令下，沿邊諸路的帥臣分別提出新的軍事計畫。有鑑於五路並進造成兵力分散，主持熙河路軍事的宦官李憲（1042-1092）建議集中力量從涇原路進兵，以熙寧寨爲起點，逐步興築十幾個城堡，深入敵境四百餘里至鳴沙城，作爲進攻靈州的基地。[11] 神宗對此提案十分心動，命令李憲開始調兵籌糧，並於元豐五年二月，特派親信宦官李舜舉（1033-1082）爲「照管涇原路經略司一行軍馬，兼參議軍中大事」，[12] 監督此事的進行。預計在六月間要於涇原路集結軍隊二十萬，馬四萬匹；運糧民夫二十萬，牲口二萬匹。[13] 但是，要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進行兩次大規模的出征行動，耗費的錢糧與人力甚巨，對陝西地區的民衆與官員造成極大的負擔。奉命執行後勤調度的范純粹（1032-1101）分別於四月底與五月初上奏反對出兵，指出籌集所需的糧餉與民夫有現實上的困難，強迫百姓參與運輸恐將在陝西引發動亂。[14] 但是，神宗不爲所動。由於李憲假借皇命不斷催逼，陝西的地方官只得強徵百姓來執行龐大的運糧工作，導致平民爲求逃避徵集，甚至群聚抗拒，引發社會騷動。直到李舜舉返回京師向神宗報告：「財糧未備，人夫憚行」，並強調：「若再出師，關中必亂」，才說服

10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點校本，以下簡稱《長編》），卷 327「元豐五年六月」，頁 7880。

11 李憲計畫的具體內容見《長編》，卷 321「元豐四年十二月」，頁 7750-7752；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兵〉28 之 25-27，頁 7282-7283。

12 《宋會要輯稿》，〈職官〉41 之 77，頁 3205。

13 據范純粹等人的上奏，見《長編》，卷 326「元豐五年四月」，頁 7832。

14 《長編》，卷 326「元豐五年四月」，頁 7832-7834；卷 326「元豐五年五月」，頁 7841-7843。

神宗放棄此一計畫，於五月間下令遣散已徵集的民夫。[15]

但是，神宗雖然放棄了大規模深入敵境築城的計畫，卻轉而對另一個規模較小的提議產生興趣。這是由鄜延路邊帥沈括（1031-1095）與种諤（1027-1083）所提進築橫山的計畫，主張乘涇原路大軍出擊，敵方主力無暇兼顧之時，以鄜延路的兵力進佔橫山北界的古烏延城，在此修築城堡，以求長期控制橫山地區。[16] 位於現在陝西北部的橫山構成宋、夏之間的制高區，宋人稱爲「山界」，若能取得控制權，則將擁有居高俯瞰靈州的戰略優勢。[17] 神宗爲求明確評估此一計畫，在五月廿六日下令給事中徐禧（1035-1082）與李舜舉至陝西與沈括等人商議，徐禧因而以皇帝敕使的身分主導全局。

徐禧之所以積極投入築城之事，與他的仕宦生涯正遭遇嚴重的危機有關。王安石與其支持者在熙寧年間爲求推行「新政」，拔擢了一批仕宦經歷尚淺的讀書人，徐禧即爲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沒有科舉功名的情況下，靠著呂惠卿（1032-1111）的推薦，上呈治策二十四篇，而大受神宗的賞識，於熙寧六年（1073）授予官職。[18] 神宗甚至當面對徐禧說：「朕多閱人，未見有如卿者。」[19] 君主既如此厚愛，徐禧的官職升遷迅速就不令人意外了。在幾年之間，他已歷任監察御史裏行、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知諫院等職位。元豐元年（1078）陝西諸路的守臣對於軍事政策爆發爭議，神宗特派徐禧至陝西視察處理；次年，更任命他爲知渭州，掌管涇原路的防務，但徐禧旋即因遭逢母喪而去職。[20] 等到服喪期滿，神宗再予重任，於元豐五年四月廿六日任命徐禧爲試御史中丞，成爲御史臺的長官。[21] 但是，徐禧就任後的作爲卻令神

15 參見梁庚堯，〈北宋元豐伐夏戰爭的軍糧問題〉，頁 80-82。

16 《宋會要輯稿》，〈方域〉19 之 47-49，頁 7649-7659；《長編》，卷 326「元豐五年五月」，頁 7856-7858。

17 橫山的位置及其重要性，參見李蔚，〈宋夏橫山之爭述論〉，《民族研究》1987.6(1987.11): 68-69；江天健，〈宋夏戰爭中對於橫山之爭奪〉，《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4(1992.7): 33-34。

18 《長編》，卷 248「熙寧六年七月」，頁 6056。

19 《宋史》，卷 334〈徐禧傳〉，頁 10721。

20 王偁，《東都事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 86〈徐禧傳〉，頁 1309-1310；《宋史》，卷 334〈徐禧傳〉，頁 10721-10722；《長編》，卷 301「元豐二年十二月」，頁 7333。

21 《宋會要輯稿》，〈職官〉17 之 24，頁 2746；《長編》，卷 325「元豐五年四月」，頁

宗大感失望。由於感念呂惠卿的提拔，他在行事與言論上明顯偏向惠卿，被神宗與主政大臣視爲朋黨，不適合擔任言職，上任未滿一個月即被改派爲給事中：

> 上謂執政曰：「徐禧舉孔武仲、邢恕爲御史，如何？」王安禮曰：「武仲與恕志趣豈可爲御史？」張璪曰：「此兩人皆異論者。」上曰：「徐禧論事，其意漸可見，大率懷呂惠卿之恩，尤欲進異論之人。蓋惠卿已叛去王安石，故多結附往時異論之人，欲以爲黨。唐坰乃上書薦惠卿天下奇才，蓋坰適過揚，見惠卿，其事可知。禧自爲中丞，昨日方請對，情狀已露。」王珪曰：「賴陛下早辨。」上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豈宜更在此位？」張璪曰：「今日即欲別除一官。」安禮曰：「禧號能治邊，或授以帥爲宜。」上曰：「雖稍加進寵，與外任無害。」……仍詔中書省，命詞止云「門下省關掌出納命令之重，故選才換授」，勿言禧不當處言職也。[22]

可見，神宗雖不滿徐禧黨附呂惠卿，對他的才能仍有期待，不願因此而將他罷黜不用，而計畫外派至邊區任職。適逢沈括等人的奏書上達，神宗便派徐禧至鄜延路「計議邊事」，審視進築橫山的可行性。[23] 徐禧掌管御史臺未久即遭撤換，他自然能感受到神宗對自己的不滿，在邊區力求表現就成爲維繫仕宦前途的希望所寄，何況他素來自負於兵學，卻一直未得到表現的機會，因而力求主導此事。

徐禧到達陝西後開始與沈括合作，而排擠种諤。面對此種不利的發展，种諤在六月間十一次上章要求進京面奏自己的計畫，才得到覲見神宗的機會。但是，神宗在聽完种諤的面奏之後，卻命令他儘速返回延州與徐禧商議。[24] 由此可見，神宗對於委任徐禧主導進築橫山之事已有定見。徐禧在七月間一方面藉由彈劾种諤在靈州之役的過失，削弱种諤對邊事的發言權；一方面提出新的築城計畫，主張在橫山地區修築六寨和六個小型堡壘，而距宋軍據點米脂寨五十里之遙的永樂埭則取代了古烏延城，成爲第一個修築的目

7820。

22 《長編》，卷 326「元豐五年五月」，頁 7845-7846。

23 《宋會要輯稿》，〈兵〉8 之 28〈夏州〉，頁 6901；《長編》，卷 326「元豐五年五月」，頁 7859。

24 《長編》，卷 327「元豐五年六月」，頁 7879；卷 328「元豐五年七月」，頁 7893-7894。

標。[25] 神宗迅速批准了這個新的計畫，由徐禧與沈括指揮鄜延路的部隊，於八月初出動築城。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進築橫山的行動從研議到付諸執行只經歷兩個多月的時間，顯然是一個倉促成行的軍事行動，而且與官員之間的權力鬥爭有密切的關係。當神宗在元豐五年初決定採行李憲由涇原路進兵的計畫時，素與李憲不合的种諤不甘於失去表現的機會，即與沈括提議以所轄兵力進佔橫山。[26] 等到李憲的計畫被取消，神宗派徐禧勘查橫山計畫的可行性，甫於朝廷政爭中落居下風的徐禧，成功地排擠种諤，取得主導權，致使整個計畫的規模擴大，而且改以永樂埭爲首先築城的目標。如此一來，宋軍行動的主導者就由經營橫山地區多年的宿將，[27] 轉成毫無實戰經驗的文臣。

三、築城行動與挫敗

在徐禧的主持下，宋軍於八月七日自延州出發，至二十五日到達永樂埭並開始築城。[28] 西夏得知宋軍行動，陸續派兵來襲，但並未有效阻礙宋軍的進度。[29] 至九月六日築城完畢，沈括等人隨即帶軍回到米脂寨以準備後續的行動：

> 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楊元孫言：「新修永樂城畢。九月七日，沈括先部中軍、右軍、左虞候軍至米脂寨，候總管曲珍將四軍及選鋒至，進築城寨。」又言：「進築城寨切不可遲，西賊既失橫山，非晚必須絕減。」[30]

可見，爲求儘快完成其餘十一座堡寨的興築，宋軍自九月七日起陸續離開永樂城。神宗在九月十四日得到這份奏報後的批示是：「若留兵三、五千在銀

25 《長編》，卷 328「元豐五年七月」，頁 7893-7896。

26 种諤一直與李憲不合，見《長編》，卷 324「元豐五年三月」，頁 7807。

27 种諤早在熙寧年間即有意進佔橫山地區，參見江天健，〈宋夏戰爭中對於橫山之爭奪〉，頁 42-43。

28 宋軍出發的日期據李燾的考證，見《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八月」，頁 7921-7922。

29 《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26。

30 《宋會要輯稿》，〈方域〉19 之 9〈進築城寨〉，頁 7630；可參見《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31。

川寨，爲戰守之備，移大軍修築以次城寨，如此措置有無利害，詳度一面施行。」[31] 顯然，對神宗君臣而言，永樂城只是整個行動的開端，築城完畢後，只留少數兵力駐防，大軍則依原訂計畫繼續進行後續的修築，至於敵方可能的進犯行動並不在考慮之列。[32] 不過，當宋軍返回米脂寨後，得到西夏大軍已逼進永樂城下的消息。徐禧視擊潰敵軍主力爲建立功業的良機，急忙帶兵回永樂城，原來的築城行動就轉變成與敵軍的正面交鋒。

徐禧作出此一決定，與他素來輕視西夏的軍力有關。[33] 不過，神宗的態度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自熙寧年間經營熙河地區以來，宋軍在西向拓邊的過程中一直未遭遇重大的挫折。特別是元豐四年五路攻夏時，對方採取避免決戰的策略，神宗深以不能捕捉敵軍主力爲憾。當元豐五年，邊區不斷傳來西夏大軍集結，意圖進犯的情報，神宗不僅不以爲懼，反而視之爲大好的機會，期待敵方大舉來犯，一舉殲滅。例如：他在五月間得知敵方可能「諸路入寇」時，下詔李憲、沈括等人：

> 自去歲興師以來，惟患羌賊迴避官軍，致不能大有尅獲。賊今果如所報，則中國正得良便，機不可失。惟要探報得實，準擬有素，以本路兵馬合成大陣，守控要害，伺其深入，痛行掩殺，則我用力少而收功多矣。[34]

由此可見，神宗對於己方的戰力甚有信心，要求前線的將帥積極求戰，追求重大的戰果。徐禧在出兵之前，神宗派使者叮囑他：「今既同預總兵，要在拊御士卒，均甘苦，平賞罰，力行前日垂拱之言，竚待奇績也。」[35] 看來徐禧在朝之時曾大談用兵之道，而使君主滿懷期待。若僅築城而無戰功，對徐禧而言也是難以符合君主所期待的「奇績」。

對鄜延路的將領而言，他們根本不希望受一位毫無經驗文官的指揮。徐

---

31 《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31；《宋會要輯稿》，〈方域〉19 之 9〈進築城寨〉，頁 7630。

32 據司馬光的《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標點本），卷 14 記載，徐禧在築城完畢後恐沈括分其功，說：「城略已就矣，當與存中歸延安。」恐與事實不符。沈括既呈報神宗繼續進築城寨，自無回軍延州（延安府）的打算。見該卷，頁 284。

33 《宋史》，卷 334〈徐禧傳〉，頁 10724；《涑水紀聞》，卷 14，頁 285。

34 《長編》，卷 326「元豐五年五月」，頁 7848。

35 《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八月」，頁 7919-7920。

禧於九月八日到達永樂城時，總管曲珍（1031-1089）立即建議他退回塞內督戰，正是此一心態的反映。[36] 急於立功的徐禧自然不肯接受此一提議，並對諸將的其他建議皆置若罔聞：

> 復還永樂，軍無斥堠，比入城，敵傾國至。諸將皆請乘其未集襲之，禧又不從。高永能言尤切，曰：「羌性輕率，出不意而輒加之笞叱，則氣折不能害人。若持疑不斷，縱其跳梁，將無所不至。今先至者皆精兵，急與戰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兵，亦不敢跬步進，此常勢也。塵埃障天，必數十萬之眾，使俱集，則眾寡不支，大事去矣！」禧岸然捋其鬚，謂永能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37]

徐禧並無實戰經驗，他對於軍事的理解顯然來自於熟讀兵書及史書。因此，他也許熟知兵學原理，卻缺乏掌握作戰契機的能力。由他與高永能的對話看來，是期待敵人全數集結再一舉殲滅，以求取最大的勝利，實際上卻自陷寡眾不敵的困境。次日，徐禧命曲珍整軍出戰，宋軍面對在數量上佔有絕對優勢的敵軍，軍心動搖，曲珍建議收軍入城防禦，徐禧拒絕。結果兩軍正面交鋒，宋軍大敗，永樂城遂陷入敵軍的包圍。[38]

徐禧陷入兵敗被圍的困境，距離五十里之外的沈括雖統有約一萬人的兵力，[39] 卻慴於敵軍的數量而不敢全力救援。加上西夏又派兵攻擊米脂、綏德等城寨，使沈括難以判斷對方的眞正目標，竟因此而放棄救援，退守綏德。他對部將說：

> 永樂之勝敗，未繫邊勢之重輕。綏德，國之門户，失綏德則延州爲敵所逼，勝敗未可知，關中必震。此大機會也，寧釋永樂而救綏德。[40]

沈括本爲築城計畫的提議者，現在卻主張永樂城的得失並不重要。此種前後矛盾的態度，顯示他在面對危機時的慌亂，也反映了宋軍行動缺乏整體的戰略規劃，只是徐、沈二人追求表現的即興之舉。正因爲對敵方可能的反制行

36 《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八月」，頁 7927。

37 《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35。

38 雙方交戰的過程，見《涑水紀聞》，卷 14，頁 284；《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36。

39 《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32。

40 《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32-7933。

動毫無準備，一旦戰敗，即進退失據，只能等待中央及諸路的支援。但是，由於距離遙遠，等到神宗得知永樂被圍，下令諸路出兵救援已是九月十六日。[41] 由於外援不至，永樂城宋軍的劣勢無法扭轉，諸將建議突圍，但徐禧拒絕棄城而走，執意堅守。[42] 但在缺水、斷糧的情況下，宋軍只支撐到二十日，城陷之際，徐禧和李舜舉皆被殺，只有少數部隊隨曲珍突圍而出。[43]

探究宋軍戰敗的原因，徐禧、沈括在戰場上的處置失當自然難辭其咎，但我們不應忽略整體行動規劃上的明顯缺失。神宗君臣早已知悉西夏集結大軍，但在計畫進築橫山時卻未預作考量。徐禧向神宗報告築城計畫時說：「城堅守備，則賊不敢攻；兵衆將武，則賊不敢戰。」[44] 可以看出他對於情勢的判斷太過樂觀，敵方的大舉來襲根本不在原本的考量範圍內。永樂城被圍之後，鄜延路以外的駐軍都在等候朝命，不敢主動救援。神宗於九月十六日下令救援時，即估計諸路援兵須「十數日」方可集結，緩不濟急的狀況十分明顯。因此，在兩天後他又下令沈括向徐禧傳達「潰圍棄城」的指示，[45] 接著又以种諤取代沈括全權處理救援任務。[46] 只是這些指令傳達至陝西時皆已過了時效，沒有產生任何效果。在永樂城淪陷之後，范純粹曾對此一缺失提出批判：

> 陝西轉運副使、權環慶經略司范純粹奏：「近者，伏見鄜延路行營軍馬，以賊兵大至，永樂被圍，徐禧以下皆在圍中，勢有不利，須藉鄰援，本路經略司牒環慶等路差發兵馬。是時，臣適在環慶，親見曾布議論，以謂不奉詔旨，不敢擅遣。後至降到朝旨，果令差發，未及延州，而永樂新城既已不守，……機會之失，害事如此！臣檢準先降戰守約束，諸路並於平日差定主兵官將，準備互相應援，或賊眾大舉聚入一路，除已差兵將外，更許逐路那兵，節次策應。昨因徐禧計議邊事，悉罷策應之法。方於其時，莫有言者，而利害得失見於今日。豈有兵困重圍，請援鄰道，尚容中覆而後可哉？今邊患未消，敵情難測，願陛下深鑒近事，斷自聖心，更修久

41 《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32。
42 《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36；《涑水紀聞》，卷 14，頁 284。
43 《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37；《涑水紀聞》，卷 14，頁 284。
44 《長編》，卷 328「元豐五年七月」，頁 7895。
45 《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34。
46 沈括被調回延州，見《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38-7940。

> 長之法，以杜倉猝之患。……」詔：「陝西逐路經略安撫使，自今應有事宜，更不令別路兵馬應援，常復須本路廣爲隄備，自作枝梧，無致悞事。」[47]

在通信技術與交通運輸都不發達的時代，所有的軍事行動皆由朝廷下詔指揮，對於戰場上瞬息萬變的情勢難以掌握，救援不及的狀況無法避免。因此，范純粹希望恢復各路主動救援的作法，但神宗的回應卻是要各路自行預作準備，諸路間依舊互不支援。顯然，范純粹希望諸路守臣取得應付危機自主權的主張，並不爲想要維持「將從中御」的神宗所接受。此種作法所導致的結果是，各路的守臣往往要以一路的兵力對抗西夏一國，自然難有勝算。[48] 正因如此，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與學生討論永樂之敗時，即將戰事的失利歸咎於「不任將帥」：

> 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疏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閫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49]

神宗身居京城卻企圖主導邊區的軍事行動，導致邊帥不敢負責，一切唯皇命是從。在此情況下，神宗若能對宋軍行動有縝密的規劃，或許還能有勝算。但是，神宗雖然早有拓邊之志，在進攻西夏的行動上卻始終欠缺長遠的構想，往往聽信邊帥個別的提議，作出即興式的決策。元豐四年五路伐夏，動員軍隊與後勤支援人力高達百萬，但決策過程十分倉促，[50] 致使宋軍在準備不周的情況下進兵。宋軍在包圍靈州城後，卻缺乏攻城器具及製造的工匠，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51] 攻靈州不成，神宗又立刻接受李憲的提議，改從涇原路進攻。結果是，李憲的計畫甫於五月取消，七月間又決定由鄜延路進築橫

---

47 《長編》，卷 331「元豐五年九月」，頁 7972。

48 曾任環慶路副總管的林廣對神宗說：「諸道同力，乃國家制賊之長計。苟賊併兵寇一道，而鄰道不救，雖古名將亦無能爲。」但是，神宗一直未能對此困境做出適當的因應。見《長編》，卷 288「元豐元年二月」，頁 7055。

49 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影印標點本），卷 2 上，頁 46。

50 神宗在四月間開始籌備工作，六月間調集兵馬，八月即出兵。參見梁庚堯，〈北宋元豐伐夏戰爭的軍糧問題〉，頁 62-64。

51 《長編》，卷 319「元豐四年十一月」，頁 7707。

山。從徐禧上呈計畫到出兵築城，前後不及兩個月，築城完畢後的安排，遭遇敵軍反擊時的對策全都付之闕如。當西夏集中兵力圍攻永樂城時，宋在陝西駐防的大軍分散於諸路，既不能主動赴援，亦不敢對敵境發動反擊，朝廷的決策既如此草率，宋軍的失利自然無法避免。

總結永樂之戰的整個過程，宋軍倉促進兵，也快速遭遇挫敗。但是，西夏軍雖然獲勝，卻隨即撤兵，未進一步擴張戰果。[52] 在十多天的戰鬥之後，雙方的軍事態勢又回復到戰前的狀態。因此，作爲一場戰爭，永樂之役的過程短促；但其在政治層面上的種種影響卻在戰後逐步發酵。這是因爲持反戰立場的官員，致力於利用此一事件來扭轉君主對西夏用兵的政策。如此一來，戰後有關永樂之役的討論，就以批評主戰政策與主戰官員爲核心。

四、戰後的影響

對反戰官員而言，要求神宗放棄主戰政策的理由，在於兩次對西夏用兵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元豐六年（1083）閏六月，素來反對神宗挑起戰端的富弼（1004-1083）去世，在所進呈之遺表中對用兵西夏造成軍、民的傷害有諸多的批判，其中一段說：

> 臣閒居屏處，不能審知事實，然道路傳聞，昨來西師入界，及永樂覆沒，官兵、民夫及其齎送之人，凍餓而死亡者，無慮數十萬。臣亦恐帥臣、監司、州縣之吏未必能以實數聞於朝廷，使陛下惻然哀憫而急圖之也。[53]

由於是得之於傳聞，富弼並未提出肯定的數字，而將靈武與永樂兩場戰役損失的士兵與民夫相加，籠統地稱爲「數十萬」以強調其數量之大，而質疑主事官員並未將事實上奏朝廷。由於戰爭帶來的損失太大，富弼要求神宗「休兵息民」，對西夏採取「歸其侵土，復其爵號」的作法。[54]

神宗在位期間，只有像富弼這類的元老重臣敢藉永樂之敗進行勸諫。

---

52 西夏軍在獲勝後並未於永樂城駐守，因此，陣亡宋將高永能的子孫得以復入城中取其遺骸而回。見《長編》，卷 330「元豐五年十月」，頁 7957。

53 《長編》，卷 336「元豐六年閏六月」，頁 8107-8108。

54 《長編》，卷 336「元豐六年閏六月」，頁 8109。

但是，當神宗於元豐八年（1085）三月去世之後，情勢丕變，年幼的哲宗（1076-1100）即位，由宣仁太后（1032-1093）輔政，過去反對神宗政策的官員紛紛被擢任要職。永樂之敗成爲他們打擊神宗朝主戰官員的重要理由，即使實際主持這場戰役的徐禧和李舜舉已死，沈括早被貶官。例如：元祐元年（1086），御史中丞劉摯（1030-1098）在彈劾李憲的奏書中，指責他：

> 興靈之役，（李）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十數萬眾肝腦塗地。[55]

這段文字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具體地指出永樂之敗造成十餘萬人的死亡，這是官方文書中首次指稱永樂之役的損失人數爲「十數萬」。其次，劉摯將永樂城淪陷的責任歸咎於李憲的延誤救援，有扭曲事實之嫌。永樂被圍時，李憲及其所部在涇原路，神宗於九月十七日下令他帶兵救援，[56] 三天後永樂城即告失守。由此可見，李憲未能成功救援永樂城是時間不允許，與他是否拖延並無關連。劉摯的說辭顯然是在假借永樂之敗全面打擊像李憲這樣的主戰官員。類似的作法亦見於右司諫蘇轍（1039-1112）於元祐元年彈劾呂惠卿的奏章：

> 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57]

藉著追究呂惠卿與徐禧的長期友好關係，蘇轍將永樂之敗歸咎於未曾與聞此事的呂惠卿。他更將神宗的生病和死亡，歸因於永樂之敗所帶來的震撼，以進一步強調這群主戰官員所犯罪惡之深重。元祐四年（1089），右司諫劉安世（1048-1125）在封駁赦免沈括的詔書時也使用同樣的理由：

> （沈）括資稟姦邪，貪冒寵榮，因緣朋黨，致位從官。元豐末年，出領延師，而邀功生事，創起邊隙，永樂之禍，辱國殃民，先皇帝痛悼媿恥，以至厭代。忠義之士，疾括若讎，俾全要領，已屈典憲，豈可輒因赦宥，復起仕途？[58]

---

55 《長編》，卷 375「元祐元年四月」，頁 9106。
56 《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32。
57 《長編》，卷 378「元祐元年五月」，頁 9181。
58 《長編》，卷 433「元祐四年九月」，頁 10445。

可見，爲了阻止沈括再被起用，劉安世指責他在永樂之役的過失是導致神宗死亡的禍首，犯下如此嚴重的罪惡之人豈能予以赦免，再加起用？劉安世後來又與權給事中梁燾（1034-1097）共同上奏，批判沈括：

> 不能爲朝廷綏懷外域，而創起邊事，僥倖寵祿。及永樂陷沒，兵民之死者以數萬計，關陝瘡痍，至今未復。先皇帝雖舉責帥之典，而賜以不誅，終緣憂傷，遂棄群臣。括雖萬死，尚有餘罪。[59]

此奏所宣稱的永樂之役死亡數字略低於劉摯，但強調此一失敗導致神宗的死亡，沈括的罪孽深重。這些說辭不僅成功地阻止沈括得到赦免，[60] 也影響了後世對神宗死因的理解。

對元祐時期主政的大臣而言，反覆提及永樂之敗並不只是爲了阻止政敵的再被起用。司馬光（1019-1086）等人在主政後，提議將神宗朝攻佔之城寨交還給西夏。但是，採行此種棄地的政策必須尋找適當的交換條件，以顧全己方之顏面。范純仁（1027-1101）、范純粹兄弟都主張以過去被俘之軍民作爲交還侵地的條件，以求「取舍有名，於國威無損」。[61] 因此，元祐元年七月，宋廷在答覆西夏要求返還侵地的詔書中，即以永樂城被俘軍民作爲交換條件之一：

> 前後用兵以來，其因而所得城寨，彼此各不曾交還。今來所請，不惟前例甚明，理難頓改；兼訪在朝之論，皆謂義不可從。然朕獨以永樂之師，陷沒者眾，每一念此，常用惻然。汝儻能盡以見存漢人送歸中國，復修貢職，事上益恭，仍戢邊酋，無犯疆塞，則朕必釋然，於尺寸之地，復何顧惜。[62]

強調永樂之役宋軍被俘者眾多，而以此爲基礎，要求西夏釋放永樂城被俘的官民，並且朝貢稱臣，不再犯邊，才能取回失地。對元祐朝臣而言，放棄所得之西夏城寨是建立新外交政策的第一步，他們的最終目標是改變神宗拓邊

---

59 《長編》，卷 433「元祐四年九月」，頁 10446。

60 《長編》，卷 433「元祐四年九月」，頁 10447。沈括至元祐五年才得到赦免，結束謫官的生活，見《長編》，卷 449「元祐五年十月」，頁 10788。

61 《長編》，卷 366「元祐元年二月」，頁 8795-8796；卷 372「元祐元年三月」，頁 9008-9009。

62 《長編》，卷 382「元祐元年七月」，頁 9313。

的作法，代之以和平的對外關係。但是，改易甫去世皇帝的政策，形同指斥其缺失，主政者必須有適當的理由。司馬光雖提出「以母改子」的說法，認爲垂簾聽政的宣仁太后可以用母親的身分來改變神宗的政策，卻不如宣稱這些政策是神宗「欲爲而未能」來得名正而言順。[63] 永樂之役是神宗朝最後一次大規模對外用兵，正適合定位爲神宗由「主戰」走向「厭戰」的分水嶺，並進而宣稱與西夏和談是遵循神宗停止用兵的心意來進行。因此，元祐大臣企圖藉由永樂之役的歷史書寫來塑造神宗「厭戰」的印象，而當時所編修的《神宗實錄》就是他們的工具。《實錄》在記載永樂戰敗的過程之後，史臣加上了一段綜合性的議論：

> （徐）禧爲人狂疎而有膽氣，尤喜言兵，以爲西北唾掌可取，但將帥怯懦耳。呂惠卿以此力引之於上，故不次驟用。先是，惠卿在延州，首以邊事迎合朝廷。已而去官，沈括繼之，遂請討伐。种諤以鄜延路之師深入無功，高遵裕以環慶之師至靈州城下，狼狽而還，陝西、河東驟然困敝，天下共望朝廷息兵，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復請築城。禧素以邊事自任，故上遣往經畫之。既入賊境，不爲備，寡謀輕敵，卒遇強寇，故敗。自是之後，上始知邊臣不可信，亦厭兵事，無意西伐矣。[64]

可見，史官不僅全面批判歷來主導對西夏戰爭官員們的無能與無識，爲國家帶來巨大的損失，也斷言永樂戰後神宗已對主戰者失去信心，放棄繼續用兵的念頭。因此，藉由總結永樂之戰，主政者宣稱神宗早已無意對西夏用兵，如此一來，推動和談就不是在改變先帝的政策。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元祐大臣出於多重政治目的來回顧和論述永樂之役，在他們的筆下，永樂之戰被描寫成損失慘重（雖然在具體數字上有所出入），導致神宗改變主戰策略，並因此而生病去世。由此可見，長期以來我們對於永樂之役的印象，有相當的部分是淵源於元祐時期主政文臣的說法。因

---

63 南宋時期，魏了翁在〈跋東坡辭免中書舍人稿真跡〉中分析了此種政治動機，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四部叢刊正編》第 6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 60，頁 12-13。

64 《長編》，卷 330「元豐五年十月」，頁 7955，李燾在此段文字之後加入以下的注記：「自『呂惠卿力引徐禧』以下，朱本並削去，其意可見也。新本復存之，今從新本。」可見此段文字是元祐年間修《神宗實錄》時所寫，在紹聖年間改修時被刪去，紹興年間重修時又再加入。

此，我們應該進一步思考這些摻入了政治因素的歷史論述，是否掩蓋了某些歷史的實情？

五、政治立場與戰爭紀事

元祐大臣對永樂之戰的論述是建立在宋軍損失慘重的基礎上，到底宋方在此役的損失有多少？據城陷之後沈括、种諤等人的奏報，指稱永樂城陷造成「漢、蕃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65] 這與持反戰立場官員宣稱有數萬或十餘萬的說法顯然有巨大的差距。關於沈括等人的奏報的眞實性，神宗其實頗有懷疑，因而於元豐五年十一月下詔种諤：

> 具析沈括帶將官、使臣、軍兵若干往永樂城，永樂陷沒及緣路亡失若干，諸處存撫收集，并沈括隨行各若干以聞，不得用情增減。[66]

由此可以看出，朝廷對於參與此役部隊的數量並未有確實的掌握，加上戰場的死傷並不易統計，兵敗之後失蹤的士兵可能並未死亡，而是逃散各地，必須詳加招撫，才能得知較爲眞實的數字。不過，此次調查的結果並未留下紀錄。在缺乏官方記載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從觀察宋軍在此役動員人力的多寡，來求得接近實際狀況的損失數字。

徐禧等人帶領多少部隊進行築城工作？在不同的北宋文獻記載中差異甚大。沈括在戰後曾撰寫《自誌》，記述永樂之役的整個經過，但全文已亡佚，只有部分內容被李燾（1115-1184）引用，保存於《續資治通鑑長編》，其中有三段文字提及宋軍的人數。一是記載沈括在築城完畢後留景思誼（？-1082）等四千人守城。其次，記徐禧復入永樂城時帶兵二萬五千人。[67] 第三，記永樂城被圍時，沈括麾下有兵萬人。[68]《續資治通鑑長編》在另一條未註明出處的記事中指沈括對徐禧說：「吾衆才三萬，賊雜集之兵數十萬，

65 《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34 引《實錄》；《宋會要輯稿》，〈兵〉8 之 28，頁 6901。

66 《長編》，卷 331「元豐五年十一月」，頁 7967。

67 兩條記事皆在《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26。

68 《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32。

豈易當也？」[69] 此段記事以沈括與徐禧對話的方式呈現，恐怕也是依據沈括的《自誌》而來，城中原留守的四千人加上徐禧重新帶入的部隊即約三萬人。根據這幾段記載可以推估，宋方有三萬兵力在永樂城，另有一萬人由留在米脂寨的沈括率領，合計戰鬥部隊約四萬人，這與司馬光在《涑水紀聞》中所記相同。[70] 此外，程顥、程頤在戰後對學生說：「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71] 顯然是認爲徐禧以二萬之衆對抗西夏十萬大軍。以上沈括、司馬光和二程的三種說法雖有出入，但差異不算太大。不過，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又收錄了另一種迥異的記載，指宋軍共計「蕃漢十餘軍，所將凡八萬，役夫荷糧者倍之。」據李燾的注釋，此一數字是引用張舜民所撰〈永樂客話〉的記載。[72] 在《宋會要輯稿》中則記：「禧、舜舉與括等將蕃漢兵十餘將，凡八萬，役夫荷糧者倍之。」[73] 與《長編》的文字幾乎雷同，很可能出自相同的史源。根據此一說法，士兵加上民夫，出動的人數高達二十四萬人；在此前提下，永樂之役才有可能造成「十數萬衆肝腦塗地」的結局。

目前可見的宋代文獻中並無名爲〈永樂客話〉者。不過，學者比對《長編》的引文與《永樂大典》殘卷，發現了幾乎相同的記載。這是在《永樂大典》「城」字部「永洛故城」條下引用《元一統志》所載張舜民撰寫的〈事記〉。[74] 因此，此一〈事記〉被史家認定就是〈永樂客話〉，近二十多年來，討論宋夏戰爭的學者都認爲《大典》所收之〈事記〉完整記載了永樂之戰的過程，是具有極高價值的珍貴文獻。[75] 等到南宋慶元三年（1197）刊刻的《新

69 《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35。

70 司馬光，《涑水紀聞》，卷 14，頁 283 記徐禧等人由延州出發時：「將步騎四萬及諸路役兵」。

71 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 2 上，頁 46 記「二先生語」，不能確認出自程顥或程頤之口。

72 《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八月」，頁 7921。

73 《宋會要輯稿》，〈兵〉8 之 29，頁 6901。

74 張舜民的〈事記〉收入解縉等編，《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 9 冊，卷 8089，頁 13-16。其中有關於宋軍兵力的記載是第 14 頁：「蕃漢十餘將，凡八萬兵，役夫荷糧者倍之。」

75 包偉民在 1986 年撰寫〈沈括事跡獻疑六則〉，首先認定〈事記〉即是《永樂客話》，此文收入徐規主編，《宋史研究集刊》（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頁 306-315。

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於 2004 年影印出版，我們更可從中找到題爲「浮休居士」（張舜民的別號）所作之〈永洛城事記〉，其內容與《永樂大典》所收之〈事記〉大體相同，但更爲完整。[76] 此文在一開始說：「乙丑歲，西客有以永洛事語余者。」[77] 由此可知，張舜民是在元豐八年根據傳聞而撰寫，主要內容記載從沈括提議築城至宋軍戰敗的過程，尤其詳細描述宋軍被圍後因缺水所導致的慘況，最後指宋軍傷亡爲：「正兵及糧卒死者凡十餘萬人，官吏、將校數百人。」[78] 這個數字與前述劉摯的說法相似，在撰寫的時間上則早了一年。如果考量到張舜民在元祐元年擔任監察御史，擔任御史中丞的劉摯正是他的長官，則劉摯有關於永樂之役損失慘重的描述很可能源自〈永洛城事記〉。因此，張舜民的文章恐怕對永樂之戰的相關說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現存的北宋文獻中，對永樂之役的描述頗多歧異，張舜民宣稱這正是引發他撰寫〈永洛城事記〉的動機：

> 余嘗患永洛之事傳者紛紛不一，類多訛僞。往往朝廷之上，搢紳之間互有差異，雖有知之詳者，蓋亦畏避而不敢聞。今客言頗詳而有理，且曰：「方是時僕在延安，而親族一人自永洛城中脫歸。」故爲可信，於是書之，以貽後人。[79]

可見，張舜民宣稱當時對於永樂之役衆說紛紜，原因在於知悉事實的人懼怕觸犯忌諱而不敢加以論述，於是他根據親身經歷者的說法撰寫此文，以求保存信史。如此說來，張舜民記述永樂之戰似乎並非出於政治的動機或目的。但是，分析張舜民的政治生涯，不免對此種說法有所懷疑。元豐四年五路

梁庚堯在 1987 年撰寫〈北宋元豐伐夏戰爭的軍糧問題〉一文，即以《永樂大典》所收之〈事記〉作爲論述永樂之役的重要史料依據。從此之後，學者對此一文獻日益重視，甚至譽爲「永樂之役最真實記錄」。參見湯開健，〈熙豐時期宋夏橫山之爭的三份重要文獻〉，《寧夏社會科學》2003.3(2003.5): 75；胡玉冰，《傳統典籍中漢文西夏文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39-42。

76 佚名，《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北京：線裝書局，2004，宋集珍本叢刊影印宋慶元三年書隱齋刊本），卷 115〈永洛城事記〉，頁 5-8。《全宋文》已將此文分段標點，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卷 1819，頁 347-351。

77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 115，頁 5；《永樂大典》，卷 8089，頁 13。

78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 115，頁 7；《永樂大典》，卷 8089，頁 15。

79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 115，頁 8，此段文字不見於《永樂大典》。

伐夏時，張舜民在主將高遵裕（1026-1085）麾下擔任「管勾環慶路機宜文字」，遵裕因兵敗靈州而罷官，舜民也被降官爲承務郎，謫授「監邕州鹽米倉」，理由是他「從軍出塞，贊畫無功，作詩譏訕。」舜民上書抗議，主張自己官職卑微，所言皆不爲高遵裕所採納，不應受到重罰。神宗下令將他送至延州，由宇文昌齡追究其責任，後來改派爲監郴州茶鹽酒稅。[80] 所謂「作詩譏訕」是指他在回軍途中寫的兩首絕句：

> 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
> 青銅峽裡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休上望鄉臺。[81]

詩中直陳宋軍損失的慘重，在神宗看來，批判其主戰政策的意涵十分明顯。此外，據刊行於北宋末年的筆記《道山清話》，舜民之所以觸怒神宗還不只於此：

> 張舜民郴州之貶也，坐進〈兵論〉。世言「白骨似山沙似雪」之詩，此特一事耳，〈兵論〉近於不遜矣。[82]

由此看來，舜民所寫的〈兵論〉中對神宗有直接的批判，導致他的貶官。他自元豐六年開始貶官的生涯，[83] 後來雖經赦免，仍未被派任官職。[84] 直到元豐八年神宗去世後，政局丕變，次年六月，司馬光推薦舜民擔任館閣之職，稱

---

80 《長編》，卷 326「元豐五年五月」，頁 7843-7844；卷 330「元豐五年九月」，頁 7958。

81 張舜民，《畫墁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據知不足齋叢書本影印），卷 4〈西征回途中二絕〉，頁 7。

82 佚名，《道山清話》，收入《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標點本），第 2 編第 1 冊，頁 107。

83 張舜民有〈元豐癸亥秋季赴官郴嶺艤舟樊口與潘彥明范亨父以小艇過吉陽寺是日大風雨雪〉詩，可見他是在元豐六年秋天貶官郴州。見《畫墁集》，卷 4，頁 3。

84 《東都事略》，卷 94〈張舜民傳〉只說他「會赦得原」，未記載具體的年月。從張舜民官銜的變化來看，他在元豐五年被降爲承務郎，至元祐元年司馬光推薦他擔任館閣時則爲奉議郎，可見因朝廷恩赦而敘復官位的時間當在元祐元年以前。（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四部叢刊正編》第 4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 53〈舉張舜民充館閣劄〉，頁 1）。在元祐元年十二月任命他爲秘閣校理的詔書中只寫「奉議郎張舜民」，未記任何差遣。顯然在此之前，張舜民的官位雖得敘復，但尚未派任實際的職缺。見《長編》，卷 393「元祐元年十二月」，頁 9552。

讚他：「材氣秀異，讀書能文，剛直敢言，竭忠憂國。」[85] 顯然是看重他勇於批判神宗政策的作爲。舜民於當年十二月被任命爲秘閣校理，三個月後再升爲監察御史，[86] 仕途由此轉趨順遂。[87] 舜民一直對西向拓邊抱持反對的態度，他在紹聖三年曾勸哲宗不要輕率用兵。[88] 至徽宗即位，他在經筵陳述神宗朝用兵失敗的事例：

> 紹聖、元符間，章惇用事，謫棄他帥臣，興兵取故地，築新塞，又取河北湟、鄯等州，關中大困。因哲宗升遐，建中靖國之初，諫議大夫張舜民，邠人，熟知靈武之敗，永樂之禍，神宗致疾之由，在經筵爲上皇言之，上皇爲之感動。故章惇罷相，棄湟、鄯等州之地。[89]

文中所稱的「上皇」即指徽宗。由此可知，舜民宣稱靈州、永樂之敗爲導致神宗生病的原因，藉以說服皇帝放棄自哲宗親政以來的拓邊政策。

回顧張舜民的仕宦經歷，可以看出元豐八年正是他重返政壇的關鍵時期，他在此時書寫永樂之役的歷史，很有可能是爲了宣揚自己反對拓邊的理念。因此，儘管他自稱所寫的內容得之於親身經歷者，我們不應未加考證即予以輕信，必須從整個築城的籌備過程來思考「所將凡八萬，役夫荷糧者倍之」的記載是否符合當日之實情。

永樂築城行動從徐禧於七月提出確定的計畫，至八月七日即出兵。能如此快速行動的主要原因，在於整個築城工作主要由鄜延一路的人力與物力來承擔，需要朝廷或別路配合的部分有限。种諤在提出進築橫山計畫時就說：

> 所有合計備事，除本路及轉運司可以那移外，乞朝廷應副錢萬緡、廂軍萬五千人、工匠千人、遞馬百匹；乞於近裏州軍應副生熟鐵五萬斤、牛馬皮萬張、車二千乘，本司及轉運司備義勇、保甲萬人應副，以代禁軍有事役者。[90]

---

85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 53〈舉張舜民充館閣劄〉，頁 1。參見《長編》，卷 380「元祐元年六月」，頁 9222-9223。

86 《長編》，卷 393「元祐元年十二月」，頁 9552；卷 394「元祐二年正月」，頁 9606。

87 《東都事略》，卷 94〈張舜民傳〉，頁 1461。

88 見張舜民進呈徽宗的奏書〈論進築非便奏〉，收入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點校本），卷 140，頁 1585。

89 《邵氏聞見錄》，卷 5，頁 132。

90 《長編》，卷 326「元豐五年六月」，頁 7858；參見《宋會要輯稿》，〈方域〉19 之 49，頁

可見，要求朝廷支援的部分主要是金錢、物資及廂軍，戰鬥部隊顯然是靠鄜延路本身的兵力。從現存的紀錄來看，徐禧帶兵出發前並未見朝廷調動戰鬥部隊至鄜延路的記載。至於鄜延路的部隊究竟有多少？元豐四年伐夏時，鄜延一路幾乎是全軍出動，[91] 共派遣兵力五萬四千人，加上從京師調來七將之兵，合計九萬三千人。[92] 出師後攻圍米脂寨，與西夏大軍交戰，必有相當的死傷。攻下米脂後繼續西進，因缺糧又遇大雪，「死者十二三」，在年底全軍潰散入塞。[93] 經此龐大的損失，怎麼可能僅在相隔七個月之後出動高達八萬的部隊？

至於張舜民說，擔任後勤工作之「役夫、荷糧者」，其數量爲戰鬥部隊的兩倍，更是極不合理的比例。元豐四年大軍出塞遠征，士兵與民夫的比例約爲一比一，例如：王中正（1029-1099）一路由麟州進兵，兵六萬，民夫六萬餘；高遵裕由慶州進兵，兵八萬七千，民夫九萬五千。[94] 鄜延路的种諤帶兵九萬三千，隨行糧夫約十萬人。[95] 在元豐五年，爲了執行李憲深入築城的計畫，朝廷下令在涇原路集結禁、廂軍二十萬，運糧百姓二十萬，也是相同的比例。這兩次軍事行動都是深入敵境，需要大量的人力來運送後勤物資。反觀永樂城的興築，僅是距離宋軍據點米脂寨五十里之遠的行動，何須大批的「荷糧者」？如果動員的後勤人力高達十六萬人，即與李憲計畫由涇原路出兵的規模相去不遠。李憲的計畫既因「財糧未備，人夫憚行」而於五月間取消，則在三個月之後，鄜延路怎麼可能順利執行類似規模的行動？更值得注意的是：李舜舉在元豐五年五月以陝西民力不堪負荷爲由，說服神宗取消李憲深入築城的計畫，一個月後他奉命審視沈括等人的提議，如果與李憲的規劃一樣的勞師動衆，他爲何不加以反對？

事實上，徐禧的築城行動並不需要大量的「役夫」。依他的規劃，築一

7650。

91 因「將兵法」的實施，鄜延路的駐軍在元豐年間分隸九將，當時僅保留一將的兵力，其餘全數出征。見《長編》，卷 316「元豐四年九月」，頁 7640。

92 《長編》，卷 316「元豐四年九月」，頁 7651。

93 參見梁庚堯，〈北宋元豐伐夏戰爭的軍糧問題〉，頁 67。

94 《長編》，卷 316「元豐四年九月」，頁 7650-7651。

95 梁庚堯，〈北宋元豐伐夏戰爭的軍糧問題〉，頁 65-66。

寨用工約「十三萬餘」，築一堡「略萬三千」，[96] 宋軍既是逐一修築，投入築城的人力就不會太多。永樂城的修築前後歷時約十二天，[97] 徐禧奏報築城共「用工二十萬」，[98] 也就是說每日平均使用之工數不到兩萬。在七月間，宋廷先後下令調遣陝西各路徵集的三萬廂軍、工匠千人及義勇保甲萬人至鄜延路，[99] 以這些人力來承擔築城和運輸的任務已是綽綽有餘。何況築城橫山地區是一個倉促執行的計畫，七月定案，八月即出兵，根本沒有大規模集結軍隊與民夫的時間。因此，三萬的廂軍加上一萬的保甲應該就是執行後勤工作的主要人力。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永洛城事記〉的內容並不可信，以鄜延路正兵的數量六萬多人，扣除八個月前的折損及留守的兵力，出動四萬人恐怕已達極限。因此，司馬光所寫的「步騎四萬及諸路役兵」才是較爲接近實情的記載。也就是說，四萬的戰鬥部隊，再加上約四萬人的廂軍和保甲應爲宋軍動員人力的上限，就算這些人全部折損，也不可能產生「死者凡十餘萬人」的結果。更何況部分的後勤人力恐怕在永樂城被圍前已隨沈括回到米脂寨，以準備後續的築城工作，徐禧帶兵再入永樂城時，沈括手下也保有約一萬人的戰鬥部隊。[100] 由此可知，宋軍在此戰役中的實際損失應局限於二至三萬的戰鬥部隊及部分留在城內的廂軍和保甲。當然，喪失的部隊中，包含鄜延路最精銳的「選鋒」，對宋軍的戰力是一大打擊，也讓佔領橫山地區的希望成爲泡影。[101] 不過，鄜延畢竟只是承擔西邊防務的六個路之一，對於宋、夏的整體軍事情勢，其影響終屬有限。

---

96 《長編》，卷 328「元豐五年七月」，頁 7896。

97 《宋會要輯稿》，〈兵〉8 之 29，頁 6901。

98 《宋會要輯稿》，〈方域〉18 之 30，頁 7624；《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26。

99 《長編》，卷 328「元豐五年七月」，頁 7896、7906；《宋史》，卷 197〈兵志十一〉，頁 4916。

100 《長編》，卷 351「元豐八年正月」，頁 8403、「元豐八年二月」，頁 8409；卷 353「元豐八年三月」，頁 8456。

101 倡議進築橫山最力的种諤，在得知永樂城失陷後，即說：「禧輩死，朝廷必難其事，吾功業竟不就矣。」見趙起，《种太尉傳》（穴硯齋鈔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頁 7-8。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張舜民等持反戰立場的官員對於永樂之役損失的描述過於誇大；同樣的，他們宣稱因永樂之敗而產生的重大影響，也缺乏具體的證據。從神宗生病的紀錄來看，永樂之敗並未與其健康狀況的變化有因果關係。他在即位後首次罹患重病是在元豐五年八月至九月間。整個過程從八月十一日神宗「以疾不御前後殿」開始，[102] 當時永樂城尚未開始興築。至九月初病情急遽惡化，曾連續罷朝達八日之久，這是前所未有的狀況，當時還下令「輔臣祈福於天地、宗廟、社稷。」[103] 可見病情的嚴重。但是，當永樂城被圍期間，神宗的病況已經好轉，乃於九月十二日下詔：「近服藥有瘳，遣官謝天地、宗廟、社稷、宮觀。」[104] 在此後的一年多的時間裡，神宗並無健康轉差的跡象。呂公著（1018-1089）在元豐七年（1084）正月入覲時，曾勸神宗注意身體，所持的理由是「前歲上嘗屬疾」。[105] 顯然神宗在當時並未有疾，呂公著才會提及元豐五年生病的歷史。由此可知，永樂之敗並未對神宗的健康造成明顯的影響。

正因自己的健康尚佳，且宋軍保有再戰的實力，神宗仍致力追求對西夏的軍事勝利。李燾在修撰《續資治通鑑長編》時，曾仔細比對元祐時期所編《神宗實錄》（墨本）與紹聖年間改修《神宗實錄》（朱本）之間的差異。在永樂戰敗之後，至神宗去世之前的紀事中，李燾註明了許多據「朱本增入」的事件，其中大多數是神宗與邊帥討論對西夏的防禦及作戰策略的經過，例如：在元豐七年蘭州之戰期間，神宗曾六度降詔，指揮戰局。[106] 這些在舊黨主政期間不被收錄，而爲新黨史臣增補的史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元豐七年十月神宗頒給李憲的手詔，此詔頗長，僅摘錄其中的要點：

> 然夏國自祖宗以來，爲西方巨患，歷八十年。朝廷傾天下之力，竭四方財用，以供饋餉，尚日夜惴惴然，惟恐其盜邊也。若不乘此機隙，朝廷內外

102《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八月」，頁 7920。

103《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25。

104《長編》，卷 329「元豐五年九月」，頁 7929。

105《長編》，卷 342「元豐七年正月」，頁 8225。

106 參見胡昭曦，〈《宋神宗實錄》朱墨本輯佚簡論〉，《四川大學學報》1979.1(1979.2): 76。具體的條目包括：《長編》，卷 342「元豐七年正月」，頁 8219、8220、8224；卷 343「元豐七年二月」，頁 8246、8248、8249。

> 并力一意，多方爲謀經略，除此禍孽，則祖宗大恥，無日可雪；四方生靈賦役，無日可寬；一時主邊將帥得罪天下後世，無時可除。俯仰思之，所以今日有此申諭。昨得涇原奏，體訪去興、靈州迂直道徑，方知蘭州渡河，去賊巢甚邇。今若於四、五月間，乘賊人馬未健，加之無點集備我之際，預於黃河西上，以蘭州營造爲名，廣置排栰，尅期放下，造成浮橋，以本路預集選士、健騎數萬人，一發前去蕩除梟穴，縱不能擒戮大憝，亦足以殘破其國，使終不能自立。未知其計如何，宜密謀於心，具可否，令至親謹密之人親書奏來，無或少有洩露。昔王濬取吳，高熲平陳，曹彬等下江南，莫不出此計，卒皆能立奇功，除一時巨患。爾宜親閱其實，加意潛謀審念之。[107]

可見，神宗計畫改由蘭州出兵，渡黃河進擊，以求一舉殲敵；他期待雪祖宗之恥，去國家之大患的熱情，實溢於言表。這份手詔充分顯示神宗並未「厭戰」，自然不會被元祐史臣編入《實錄》。此時神宗雖已染疾，但尚未立儲，顯然並未預料到自己天年將盡，會在五個月之後身故，仍力圖爲來年的軍事大計預作規劃。

由以上討論可知，儘管永樂之役是一場重大的挫敗，但宋軍遭受的損失並不如反戰官員所宣稱的那般慘重。正因宋的軍事實力受損不大，神宗並未放棄發動攻擊的意志。對於反戰的朝臣而言，這是他們所不樂見的事。等到神宗身故，他們便宣揚拓邊行動所造成的傷亡之重，強調神宗已有「厭戰」之意，以防止拓境主戰的政策捲土重來。我們現在看到對永樂之役的記載，有相當的部分是在此種背景下產生。

過去學者對於神宗朝弭兵反戰言論的分析集中於理念層次，而未能探究其在現實層面留下的影響。[108] 以戰爭紀事而言，持反戰立場的官員和文人，對於戰爭的記錄與詮釋明顯有「諱勝而言敗」的傾向。此種強調作戰導致的損失，而忽略其成果的作法，曾引發不同立場官員的批判。例如：哲宗親政後，新黨官員即指責元祐史官刻意誇大元豐四年運糧民夫在伐夏途中被殺的數字，「以害先朝政事」。[109] 但是，由於持反戰立場官員留下的文獻衆多，後

107《長編》，卷 349「元豐七年十月」，頁 8376。

108 例如：李華瑞對神宗時期反戰言論的內涵有詳細論述，但並未分析反戰論造成的實質影響，參見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 82-85。

109《長編》，卷 319「元豐四年十一月」，頁 7702。

世深受其影響，對於神宗朝的拓邊行動多持負面看法。就長期發展而言，神宗朝一連串拓邊的行動雖未能達到滅亡西夏的目標，但宋軍的主動出擊，已扭轉了仁宗朝以來受制於人的軍事劣勢。在此基礎上，後續的西進拓土行動才得以在哲宗和徽宗時代持續下去。[110] 對於反戰的官員而言，這個結果卻是他們所不樂見的。因此，他們極力強調神宗朝用兵的失敗之處，並以永樂之役作爲神宗由主戰轉而厭戰的分水嶺，以求在神宗身後有效壓制主戰派的意見。在此偏見下，神宗時代的戰果就受到刻意忽視。不僅熙寧年間在開拓熙河地區時獲致的戰功少被提及，[111] 元豐年間對西夏用兵的勝利亦復如此。像是元豐四年五路出兵，雖未能一舉滅亡西夏，但宋軍曾在幾次戰役中重創夏軍，种諤在米脂寨的戰功即是一個例子。宋軍在包圍米脂寨後，先擊退號稱十餘萬的西夏援軍，再迫使城中一萬多人的守軍全部投降，則西夏在此役的損失可能並不少於宋方在永樂之戰的傷亡。[112] 但在宋人記載中，多半只言宋方在靈州糧盡退兵後遭受的損失之重，不提之前的戰果。另一個例子是元豐六年底至七年初的蘭州之戰。此役有如靈州攻防的翻版，只是攻守雙方的角色互換。西夏大軍久攻蘭州不下，因糧盡而被迫撤軍。據宋方的報告，敵軍在蘭州城下的傷亡就高達五萬人，若加上在寒冬中撤兵的損失當更爲可觀。正因損失慘重，夏軍自元豐五年起對宋所發動的一連串攻勢至此停止。但是，除了神宗之外，此一軍事成就鮮被提及。[113] 在持反戰立場官員的作品中，我們看到的是對宋方軍事行動的全盤否定，例如：富弼在元豐六年回顧前兩年的戰爭時說：

> 前日國家罄竭公私之力，以事誅討，曾不傷西人之一二也。彼其得我叛卒，取我兵械，取我金帛、糧食，不可貲數。彼將以其所獲，貽遺隣國，借兵求援，以爲邊患，是反足以增強捍也。[114]

---

110 參見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 91-103。

111 曾瑞龍對於六逋宗之戰的研究即突顯了這個現象，參見曾瑞龍，〈被遺忘的拓邊戰役：趙起《种太尉傳》所見的六逋宗之役〉，收入氏著，《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頁 79-123。

112 此一戰役的詳細經過見趙起，《种太尉傳》，頁 4-5。

113《長編》，卷 347「元豐七年七月」，頁 8325-8326。

114《長編》，卷 336「元豐六年閏六月」，頁 8108。

認爲宋軍的進擊消耗了大量的國力，但獲致的戰果很小，反而讓西夏在戰爭中虜獲許多物資和人員，得以藉此向遼國求援，抗衡宋軍的力量反而更強大。也就是說，宋的攻勢徒然造成本身大量的損失，對於削弱敵方的勢力毫無幫助。從這個例子可以明顯看出，反戰立場所導致的戰爭書寫偏頗。因此，反戰論的盛行，對於宋代的戰爭紀錄有很大的影響，此種「諱勝而言敗」的傾向是我們在研究和詮釋宋代軍事歷史時應該注意的。

六、結　論

透過研究永樂之役，可以看出北宋拓邊行動與朝廷政局發展的密切關係。神宗急切的滅西夏之心，導致朝臣與邊帥爲尋求立功的機會，競相提出各種不同的計畫。結果是，宋軍的行動往往受個別官員的提議所左右，欠缺縝密與一致的規劃。在元豐四年至八年間，宋軍計畫進攻的方式與規模不斷改變，見異思遷而不能循序漸進，徒然爲敵方製造反擊的良機，而神宗身居京城又事事干預，更增添指揮上的困難。規劃和指揮上的缺失，成爲導致宋軍戰敗的主因，這一點實與官員間存在的權力鬥爭有所關連。

另一方面，軍事行動的失敗又轉而成爲官員進行權力與政策之爭的素材。永樂之役長期成爲反戰官員據以攻擊主戰政策的理由，也使得關於此一戰役的歷史書寫受到政治立場所左右。反戰官員誇大此役的傷亡，塑造神宗厭戰的印象，以合理化他們對西夏議和的主張，並用以斥逐主戰官員。此類說法在元祐時期不斷出現，形塑了後世對於永樂之役的理解，也掩蓋了某些歷史的實情。在反戰論盛行的北宋，「諱勝而言敗」的戰爭書寫傾向顯然影響了後世史家對於北宋軍事史的理解。

從北宋歷史的長期發展來看，神宗的西向拓邊政策是劃時代的大事。宋軍一連串攻擊行動改變了自眞宗朝以來被動防禦的態勢，也引發了政府內部對主戰與反戰的激烈爭議。在此脈絡下，永樂之役所產生的影響是多元的。一方面，兵敗城陷、主帥陣亡的結果造成政壇上極大的震撼，對日後政局的走向產生深遠影響。另一方面，由於宋軍實際的傷亡尙屬有限，宋夏間的軍事態勢並未有明顯改變，宋軍仍保有主動出擊的實力，哲宗朝以降的西向拓邊行動乃能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由此可見，一場戰役所代表的歷史意義及

產生的影響，往往超越了軍事的層面，而當時人對此戰役的書寫與詮釋則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成都：巴蜀書社，1993，據涵芬樓藏版影印。
宋．王偁，《東都事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四部叢刊正編》第 4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標點本。
宋．佚名，《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北京：線裝書局，2004，宋集珍本叢刊影印宋慶元三年書隱齋刊本。
宋．佚名，《道山清話》，收入《全宋筆記》第 2 編第 1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標點本。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點校本。
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收入《全宋筆記》第 2 編第 7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標點本。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
宋．張舜民，《畫墁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據知不足齋叢書本影印。
宋．彭百川，《太平治蹟統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0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影印標點本。
宋．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點校本。
宋．趙起，《种太尉傳》，穴硯齋鈔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點校本。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四部叢刊正編》第 6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元．脫脫等編，《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點校本。
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二、近人論著

王德毅　2008 〈北宋九朝實錄修纂考〉，收錄於氏著，《宋史研究論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再版，頁 102-113。

包偉民　1986 〈沈括事跡獻疑六則〉，收錄於徐規主編，《宋史研究集刊》（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頁 306-315。

江天健　1992 〈宋夏戰爭中對於橫山之爭奪〉，《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4(1992.7): 33-58。

李華瑞　1998 《宋夏關係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李　蔚　1987 〈宋夏橫山之爭述論〉，《民族研究》1987.6(1987.11): 68-76。

胡玉冰　2007 《傳統典籍中漢文西夏文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胡昭曦　1979 〈《宋神宗實錄》朱墨本輯佚簡論〉，《四川大學學報》1979.1(1979.2): 71-78。

梁庚堯　1997 〈北宋元豐伐夏戰爭的軍糧問題〉，收錄於氏著，《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公司，頁 59-102。

傅樂成　1979 《中國通史》，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新編二版。

曾瑞龍　2006 《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香港：中華書局。

湯開健　2003 〈熙豐時期宋夏橫山之爭的三份重要文獻〉，《寧夏社會科學》2003.3(2003.5): 73-81。

趙滌賢　1994 〈北宋元豐中靈州永樂兩次戰役宋軍死者人數考〉，《學術月刊》1994.6(1994.6): 82-83。

蔡崇榜　1991 《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The Entanglement of War and Political Factions in the Northern Song: The Chronicle of the Yongle Campaign

Fang Cheng-hua*

Abstract

Traditionally, Chinese historians consider the Yongle 永樂 campaign of 1082 to have been a heavy defeat for the Song armies with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After suffering a huge number of losses, the Emperor Shenzong 神宗 decided to abandon the offensive in Xixia 西夏, resulting in the grief-stricken emperor's subsequent illness and death. However, examining surviving descriptions of the Yongle campaign in records kept by Song officials reveals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This article begins by exploring the background and course of the campaign, verifies the authenticity of traditional accounts, and argues that the writings of certain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deeply influenced later generations' impressions of this campaign. These officials, opposed to Shenzong's border expansion policy, intentionally exaggerated the Song armies' losses in the Yongle campaign and their after-affects. This was not merely intended to oppose those officials advocating war, but more importantly to emphasize the fact that it was due to this defeat that Shenzong abandoned his policy of offensives against the Tangut, thus giving currency to the policy of a return to peace talks. More

* Fang Cheng-hua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uccinctly, political bias influenced how the Yongle campaign was recorded. Due to the popularity of anti-bellicose opinion, Song army losses tend to be emphasized and military gains downplayed in the war chronicles of the Northern Song, an example of which is the record of the Yongle campaign.

Keywords: Yonglecheng 永樂城, Song Shenzong 宋神宗, Xu Xi 徐禧, Zhang Shunmin 張舜民, factionalism